鼎元钱庄:又一座中共地下金库(2)

臧 文 口述
龙高孙 执笔

许振东

鼎元为首钱庄连片,“放手放脚”盈利颇丰

当年,门面设在上海闹市区的鼎元钱庄,是按照在根据地商定的方案建立的。鼎元开张后,又继续布点,全部是私营面貌的钱庄,高邮的叫益大,扬州的叫仁泰,镇江的叫中大,与上海的鼎元衔接,主要搞“外汇”业务(根据地一直把敌占区的货币叫“外币”),实质上就是华中银行的通汇线、交通线。这批钱庄筹划得当,业务顺畅,靠的是彼此信任,像亲兄弟一样齐心合力。因为上海的鼎元是重头,筹组时我们党出资50%,许振东投资40%,剩下10%在社会招股。当时,益大靠得近,由华中银行直接领导,委派了汪华出面做经理,扬州由许介眉负责,镇江是华中银行派人管理,鼎元那边的副经理、襄理则是地下党员。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后,交通断绝,汇兑业务停止,精明的许振东立即通知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保存起来,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。

就我所知,另外那几家企业叫联丰、合众、建华、同庆,挂牌花纱布公司或进出口公司,还有的就叫贸易行,依靠着龙头鼎元的资金调度,主营业务是采购紧俏的军需物资。白色恐怖,环境险恶,在地下党领导下,许振东为首的员工们个个尽职,灵活经营。到1948年年底,鼎元向党组织上缴的黄金达900两,我们党投资的本金全部收回。那时,邓克生已升任重新组建的华中银行的副行长,我在银行的金库工作,进进出出的数目,十分清晰。不久,我们党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,鼎元注入20%的股东;夏衍和张尔华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,鼎元投过去的资金是260两黄金。接着,鼎元又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,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,全部运抵东北战场,解决了东北我军的急需。这些事,今天仍健在的陈立(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首任行长)也都十分清楚,他那时和我在同一个科里。

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,根据地连成了一大片,中国人民银行成立,华中银行的组织机构随之改变,组建了人民银行总行旗下的苏北分行,由邓克生主管。1949年5月,我军进入上海,鼎元的使命至此结束。当时我和邓克生随大军驻在泰州,老邓5月25日以“说不尽的愉快”提笔给许振东写信:“能够这样自由自在、毫无顾忌地写信给你……老许,让我们首先紧紧地握手一次吧!”他公开用“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”的信笺与信封,字里行间充溢着革命热情,往日的暗语、商界的套话,转瞬间无影无踪了。

白色恐怖下肩负重任的许振东,需要不时与党组织交换情况、接受任务。跟他接触的领导只有徐雪寒和陈明两位,可这两位又频繁穿梭于上海、香港。他们不在上海时,一旦遇上麻烦事,被指定的联系人就是朱枫。朱枫其人近些年才为世间所知,她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女战士,1950年6月在台湾就义,尸骨直到去年才迎回她的家乡安葬。当年我在上海时,在许振东家里也见过朱枫,那时只知道她是鼎元的女职员,同时在另外几家公司里也兼职,办事干练。看她那气质,显然富有教养,有大家闺秀之风范,许振东、陈志威夫妇对她敬重有加。建国以后,许振东才向我透底,说出了朱枫的真实身份:她一直是秘密党员呀。1947年间,徐雪寒应紧急情况急需去香港,朱枫为他买好了外轮头等舱的船票,许振东把自己的皮袍和礼帽借给他,帮他装扮成富商,由朱枫护送上船。开船前,徐雪寒脱下皮袍礼帽,对朱枫说:这些在香港都用不着了,你带回去还给老许吧。

家有贤妻默默相助,世间旧雨肝胆相知

我和陈志威一度朝夕相处,真切感受到许振东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那么重要的任务,志威是难得的贤内助。没有她的协助配合,老许的“放手放脚”几乎不可能。

我从苏北根据地刚出来,土里土气的,为消除别人的猜疑,志威提出替我买衣服。可我不会长住,又身无分文,当然不愿买。志威并不勉强我。她连夜踩缝纫机,改自己的衣服,改了给我穿。我在根据地,习惯紧张的行军和工作,到上海整日带孩子,心里憋得慌。志威就找书给我看,边教我织毛衣,边和我聊天,给我讲她自己的经历。志威一直在上海,大学肄业就转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,坚持到毕业,这在上世纪40年代可谓凤毛麟角。她曾想和振东一起去我们的根据地,又一起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上海;她曾打算就在上海参加工作,最后又是顾全大局,留在了家里。她默默无闻地迎来送往,让来她家落脚的每一位同志感到既安全又温暖。

年复一年与狼共舞,志威养成了高度的警惕。一次她陪我上街买毛线,逛了几家,又到一家店里,我正在看毛线,她突然拽拽我的衣角,使了个眼色,我赶紧跟着她出来。她悄悄告诉我:我们刚进去,就有两个男的跟了进来。什么年头,哪有男人进毛线店的!她机警地带着我连转几个弄堂,甩掉可能的尾巴,安全回到家里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我和邓克生只要到上海,都会去看望振东与志威。有一次志威告诉我,她几次提出要参加工作,但有关方面派人转告说,工商界许多上层人士的夫人都是全职太太,建议她还是留在家里。她再一次服从了组织安排。这位终身没有出来工作的知识女性,去世前什么“级别”“待遇”都没有,但她赢得了亲人和所有认识她的人的敬重,甚至可以说是无比的敬重。

经历过血与火,我算是有幸活下来的人,想起那些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的坎坷经历,我忍不住心酸。徐雪寒、顾准、陈国栋他们受过的委屈,以往介绍得比较多,我就不说了。邓克生1952年当过“大老虎”,叫“思想老虎”,说是右倾拦路,背了个处分,降职靠边。他和许振东的关系,每次搞运动都是交代的重点。当年老许连私方应得的那份盈利都放弃了,悉数上缴,可审查邓克生时还强加一个尾巴,硬说他俩串通把利息贪污了。明明是及时兑换成黄金了,哪来利息一说呢?1965年以后,邓克生被戴上“阶级异己分子”的帽子,“文革”动乱一起更是百口莫辩。直到1982年,邓克生去世六年了,“勾结许振东搞地下钱庄”才算审查清楚,江苏省委组织部发了正式文件,咱一家人蒙冤已达三十载。二十多年里,不管组织上如何查,老邓没有向老许透露过一个字,老许从不知情,也没有站出来分辩过。他俩凭着一种无需言表的默契,绝不授人以“攻守同盟”的半点口实。

若要我说那曲折的历史,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许振东病逝的噩耗传来时,我请孩子们代拟代书了挽联“世间旧雨相知肝胆;泉下重逢共览诗书”,把老许和邓克生几十年生生死死的情谊都融化进去了。要说这生死情谊,自然也包含徐雪寒、陈国栋、朱枫等在内。那是一群纯净的理想主义者,他们精诚合作甘苦与共,奔波在腥风血雨的年代,并创造出非凡的功绩。

记得徐雪寒有一段高度赞扬老许的话:“党在和许振东长期交往中,确认他政治进步积极支持党的革命事业,经济上廉洁清正,分文不入私囊,又精通金融业务,善于经营管理,所以委以重任。他也慷慨接受任务,身家性命在所不惜。”我觉得,许振东毕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,和秘密党员毫无区别。人们写隐蔽战线的故事,已经写了很多很多了,写过潘汉年,写过徐雪寒,写过朱枫,其实也应该写写许振东和他的鼎元钱庄。

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2年第11期)